

长城抗战概述

黃紹竑

一 长城抗战前的国内外形势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始終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他把中国共产党历次团结抗战的宣言封锁了,他认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个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倒是可以忍让妥协的,把中国共产党剿灭之后再行抗日。那时国内军阀由于宁粤的和谈合作表面上虽然是统一了,但有些地方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不论两广、四川、云南、山西都是由军阀统治着,本质上一点没有改变。

蒋介石政府的外交政策,唯一是向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国际联盟呼吁,希望用国际联盟的力量,压迫日本,交还东北,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国联的身上。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声称:“中国将其国家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的余地。”当时被蒋介石、张学良打倒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有电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上的呼声。但南京政府充耳不闻。

由于中国的呼吁，国联派出李頓調查团到东北調查。李頓調查团先到日本，“秉承”日本政府的意旨之后才到中国来。南京政府就好像救星一样殷勤諂媚地来欢迎它，希望它說中国的好話，主持公道。参加調查团的唯一的中国代表顧維鈞随調查团到东北后，日本关东軍就不让他与指定之外的任何中国人接触。不但他，就是中国名記者戈公振作某些訪問也被拘捕。据顧維鈞回来报告的时候說，有些重要的場合他都无法参加；他唯一見到的中国人是火車上旅館里的侍役。有一个侍役秘密地流着眼泪对他說：“我們不愿意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意做亡国奴。我們希望政府抗战，我們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們自己也去参加义勇軍抗战。”顧并說义勇軍在东北各地声势很大，日本鬼子很害怕。

李頓調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了，它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但不承認滿洲国。蔣介石政府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但日本政府却还認為不滿意。因此日本南陆相声明称：国际盟約不能适用于有特殊情形之地方协定，决不能接受国联的決議的調停与裁判，否則日本退出国联亦在所不辞。果然日本不久就退出国联，繼續进行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

当时东北义勇軍真是如火如荼，馬占山、馮占海、苏炳文、李杜、丁超等的大名几乎妇孺皆知。爱国人士既对蔣介石的抗战失望，就把希望寄託在义勇軍的身上。但蔣介石对于义勇軍非常冷淡，不但沒有絲毫物質上的支援，也沒有一些精神上的鼓励。蔣介石在一个义勇軍代表的报告里批示：“已据轉交部彙报編录增光史册矣。”他并下令禁止組織义勇軍，鎮压人民的爱国运动。义勇軍孤軍奋斗，經不起日軍的压迫，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馬占山、

苏炳文、李杜各部都退入苏联境内，解除武装。馮占海等部则退入热河境内。剩下的义勇军，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更艰巨、更深入、更持久的抗战。关东军就趁此进兵热河、进攻长城。

二 蒋介石迫张学良下野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一月六日，日本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是：（一）由綏中沿北宁铁路向山海关正面进攻；（二）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綫进攻；（三）由开鲁向赤峯进攻；（四）由林西向多倫进攻。（三）、（四）各路皆会师承德，然后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炮声响了，他知道再不抵抗，連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駐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开始进入热河布防。那时他名义上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閻錫山集团、馮玉祥集团，在一九三〇年内战的时候，都是由于他帮助蒋介石而致失败的，他怕閻、馮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单独东北军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唯一的办法还是求援于蒋介石。

蒋介石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引诱两广参加“剿共”的阴谋。这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叫我同训练副监徐景唐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他好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在此稍前的时候，陈济棠驻沪代表楊德昭曾经谈过：

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則广东愿意負江西“剿匪”的責任。蔣介石就抓住这个机会，使两广軍隊到江西参加“剿共”。不料陈济棠揭破了他的阴谋，同时也暴露了陈自己的抗日的假面具。我和徐景唐到了广州，陈召开軍事會議，所有两广的高級將領及高級党政人員都参加。他們表面上不肯說不出兵，而是用要求軍費和要求械彈来拒絕。陈次日邀我单独到他家里談話，他說：“季寬，我們是十几年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我們要講真心話。老蔣要我出兵江西，系唔系（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們的軍隊鉗着，好抽出他的軍隊来搞我們呀？我想一定是的，他的抗战是假的。你睇（看）系唔系囉？”我笑笑不答，也就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又說：“不但日軍占領北平，就是占領南京，我也不肯調兵到江西。”我回到南京把这种情形向蔣介石报告了。蔣就以此为借口，仅調尚未参加“剿共”的中央軍黃杰的第二师，关麟徵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八十三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其实未参加“剿共”的中央軍还多，如胡宗南的第一师，駐在河南閑着沒事。我当时在报上发表两广團結抗战，都是一些鬼話。^①

二月下旬的某日，蔣介石召見了我，要我去当北平軍分会參謀团參謀长。我說：“我与汉卿（张学良号）未曾見過面、处过事，而且軍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誤事。还請委座（指蔣）另行考虑吧。”其实我心里对参加抗战是愿意的，但我以内政部部长的地位去当张学良的參謀长，心里总有些不愿意。蔣明白我的意思，他說：“北平軍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參謀长；而且敬之（何应欽号）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軍事上帮帮敬

① 本輯第七輯《我与蔣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內，誤把到广东去这段經過，写在塘沽协定之后，应予更正。

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我知道他已决心要张学良下野,由何应欽来代替;我和何应欽还合得来,就答应了。

接着財政部部长宋子文、軍政部部长何应欽、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內政部部长黃紹竑、參謀部次长楊杰、軍政部厅长王倫、參謀部厅长熊斌、还有宋子文的朋友銀行家胡六(胡筠庄)的老婆胡六嫂,一行人浩浩蕩蕩专車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重視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內容却各有各的作用。宋子文表面上似乎是作財政上的支援,其实是用来对张学良說私話,并为他出国作布置;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綫,不久就回去了。何应欽表面上似乎是作軍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則是要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針摸摸底;不久也回去了,由次长刘崇杰代替。我虽然是參謀长,但主要是供以后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因为蔣認為我还有些“肆应”之才,可以做“安內”的工作。专車到了徐州,不敢經天津到达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来为难。其实日本人对这些人去北平,是欢迎的。专車由徐州轉隴海路經郑州,再轉平汉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車。大約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张学良並沒有到站迎接,因为他还在黑甜乡里起不来,派人招待。我同何应欽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宋子文另有他的秘密住所。

当日下午两点多鐘,我同何应欽去順承王府(即現在全国政协秘书处)拜訪张学良,听取前方的情况。他骨瘦如柴,病容滿面,精神頹喪。他把热河及山海关方面的情况告訴我們,那时听他的口气,对战局好象还有把握。坐談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嗎啡針。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少帅”見面的情形。我們每日下午都得到那里商談,我心里想: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相处下去。閑了沒事,也

和一些北平上层人士接触，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恐怕要誤了国家大事。

日軍于二月二十四日向热河进攻，先后占領了开魯、凌南以东各地，繼續向赤峯、建平、凌源等地进攻。热河主席湯玉麟聞赤峯、建平、凌源等地失守消息，即在承德作撤退准备：先把所有的汽車裝載他私人的財產，向古北口撤退，因而影响了前方的士气。号称险要的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黃土梁子主要陣地也自动放弃不守。日軍既占領黃土梁子，即分兵两路：以一部南向平泉攻喜峯口，以主力西向承德攻古北口。日軍于三月四日占領承德，湯玉麟已于早一日退逃灤平。张学良聞訊大为震惊，当即下令通緝湯玉麟。张学良那时对我们曾作出要亲率王以哲等軍去恢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拚到底的豪語，但迫于輿論，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駐在南昌专心致力进行“围剿”紅軍的蔣介石，知道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即于三月六日乘飞机到汉口，改乘火車到石家庄，宋子文也同来。何应欽和我接到电报后，就先到石家庄去迎候，同行的还有山西閻錫山的代表徐永昌。蔣介石在車上召見了我们，听我们把情况报告之后，問我們对于张学良辞职的意見。蔣介石在南京早已决定要何应欽来取张学良而代之的，現在为什么还要問呢？因为对于东北軍的底子还没有摸清楚，还有些顧虑。我們說：第一、如果还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輿論不滿，而且北方軍隊如山西閻錫山的軍隊，西北軍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們以后就指望这些軍隊繼續抗战，中央軍是不能多調出来的。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軍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拚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拚下去也不会有好結果。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

东北軍也不会有什么顧慮。蔣介石根据我們的报告，就决心准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欽来接替。

张学良知道蔣介石来石家庄，也打电报去，想和何应欽等一同去石家庄迎候。但蔣介石还没有得到何应欽和我的报告，主意沒有打定之前，不便就与他見面，就复电說：“前方軍事吃紧，調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約地見面。”蔣介石同我們見面商量的次日，就約张学良到保定見面。张学良先到車站迎候，蔣介石后到，在蔣介石的专車上見面，仅有宋子文一人在座。何应欽和我在另一专車上，沒有参加，怎样談的，我們都不知道。他們会談仅仅个把鐘头，张学良就很頹喪地辞了出来。蔣介石走后，我們和张学良各乘各的专車回北平。次日张学良就发出辞职下野的通电，不日离开北平到上海去了。

三 何应欽的作战部署

何应欽繼张学良任北平軍分会代理委員長，負华北軍事的責任；我当了參謀长，都在居仁堂办公。參謀团設在府右街南口右側的大樓（即現在北京市政府地址），除由南京带来几个高参——侯成、陶鈞、徐祖詒、徐佛觀等外，其余都是东北軍的原班人馬。何委东北軍參謀长鮑文樾为軍分会办公厅主任。原任张学良參謀处处长的金元錚（前清貴胄，陸軍小学、保定軍官三期毕业）是滿洲族人，恐怕他靠不住，就加設了一个作战处，由徐祖詒任处长，也在居仁堂办公。何应欽和我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倚靠两千多年来秦始皇遺留下来的万里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工事，想守住长城各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峯口、冷口，阻止日軍进入关內。独石口方面的防务調傅作义部队担任，傅作义本

人进驻张家口。古北口方面把溃下来的东北军王以哲等部撤下整理，而以由南方调来的中央军徐廷瑤的十七军(辖第二师黄杰、第二十五师关麟徵、第八十三师刘戡)担任。喜峯口方面的防务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担任。冷口方面的防务以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担任。由长城撤下来的东北军整理后，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担任防御，同时令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作敌后的威胁，使日军不能不有一些后顾。这是完全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到进攻和收复热河、收复失地。

日本关东军既占领了黄土梁子，即分兵一部(大约一个旅团)南下占领平泉，向喜峯口进攻。东北军万福麟所部直溃口内，日军先头于三月九日占领喜峯口。调往该方面增防的原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所部主力方到达遵化，先头冯治安师黄昏后到达喜峯口。冯部乘敌人不备进行逆袭，黑夜里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敌人不少，也有所虏获，把喜峯口夺回。这是长城抗战唯一的胜利。捷报传来，振奋全国的人心；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日军遭此意外的挫折，重新部署进攻，该方面一时成为对峙的状态。

日军主力(约一个师团以上)占领承德后，即向古北口进攻。东北军王以哲部节节败退，企图固守古北口，等待中央军徐廷瑤部的增援。徐廷瑤军先头关麟徵第二十五师，于三月九日夜到达古北口城，而王以哲已被日军击败，急于退走，十一日就把古北口关口丢了。关麟徵亲率所部增援，企图夺回古北口，不幸中弹受伤，不能达到目的，乃据守南天门阵地。黄杰的第二师到达增防后，该方面也成了对峙的状态。刘戡的八十三师也调到该方面，由参谋次长杨杰任总指挥。

这时我們觉得榆关方面防守石門寨的何柱国軍过于突出，不能不顧到冷口万一被敌人突破，敌人就可以占領迁安下灤州；喜峯口万一被敌人突破，則敌人可以占領丰潤下唐山，截断榆关方面何柱国的归路。为了縮短战綫，把何柱国軍調駐灤河西岸，破坏灤河鉄桥，依靠灤河作为防御。同时增強冷口方面的防御兵力。我們于三月二十日給何柱国撤退的命令，平津日本报纸次晨就清清楚楚地刊登了出来。这当然是由于汉奸或电报密碼洩漏出来的，可見我們作战的一切計劃敌人是清清楚楚的。国内报纸則攻击这次的撤退是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欽不得不向記者声明：“我軍此次对于灤东的軍事調动完全是为了战略上的关系，絕无政治上的关系。”

孙殿英所部大約有三万余人，在三月以前即进达赤峯、围場地带，支援那方面的东北义勇軍。日軍进攻热河，同时以騎兵一个旅团附飞机坦克向孙部进攻，孙部潰退多倫以东地区。何应欽原要孙固守多倫以东的山岳地带，以減輕日軍对长城进攻的压力。但孙經不起日軍的压迫，于三月上旬放弃多倫，繼續向沽源潰退。孙部軍紀极坏，沿途騷扰不堪，外間并有謠言，說孙已接受伪滿的委任，并没有与日軍接触，就向后撤退。何应欽大为惊疑，因而对他的軍餉、給养扣而不发，他的駐平办事处处长找我訴說經過，我想这样总不是办法，于是自告奋勇，到沽源多倫前方去視察以明真相，好作处理。我乘火車到张家口，会同傅作义坐汽車向沽源前进，路經张北县与傅部的將領們見面。在沽源以北的平地脑保（蒙語，泉水的意思）碰到了孙殿英。他向我叙述經過說：“多倫在地图上虽是个大地方，但人烟稀少，給养困难，而且四面都是荒漠平沙。虽有些山，但是与南边的山完全两样，寸草不生，山势平延，很难阻

止敌人坦克車的冲击和飞机的轰炸。即使沒有敌人到来，我这三万多人也不能久駐那里，既沒有兵站补給，又沒有积儲，一切都要就地想办法，所以軍紀太坏，事实就是这样，我是承認的。至于說我不見敌人就潰退，請部长你去看看，我那些伤兵是那里来的呢？又有人造謠說我受了滿洲国的委任，部长你知道，全国都知道，我孙殿英挖了小溥仪的祖坟，即使我去投他，他肯容我嗎？岂不是把我这麻子脑袋往刀上送？我孙殿英虽然是土匪出身，混了几十年，也还知道一些民族大义，即使至愚也知道自已与小溥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造謠的人无非是想栽我，請部长轉报何部长，并且妥为处理。我一定服从命令，絕无二心。”我心里想他后面这段話，倒是实情，他所以不投伪滿的关键就在这里。于是我答应即发欠款四十万元和面粉四万袋，并指定他在沽源、独石口、鎮岭口一带向东面北面布防，好抽出傅作义部队作为机动使用。

在这期間，北平的古物正在南运。古物在北平的有两部分：一是属故宮博物院的，一是属于內政部古物陈列所的。当本年一月山海关失陷时，南京政府行政院決議設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并以榆关陷落平津危险，决将古物南运保存。北平各团体反对政府迁移古物，一月二十三日北平各界組織保护古物协会，通电反对南运，謂政府須全力守北平，若虑古物資敌，則华北数千万方里数千万人民应先保护，不应只顧古物等語。这个义正詞严的通电，南京政府不加理睬和反省，仍然用軍警保护运出，直到四月間尚未运完。我到北平的时候，內政部押运人員向我請示，那时我正忙于軍事，就說：“整个河北和北平正处在危险状态，守护之不暇，还有工夫顧那些东西嗎？你尽量地运，运出多少算多少吧。”有一天，我到古物陈列所去看看，那位所长問我：“部长要不要一两件东西？”我

听了很惊异地說：“所里陈列的古物，可以任由长官来要的吗？可以由你送人的吗？”他听见我的话有责备的意思，就轉口說：“并不是所里已经陈列的东西，那都是頂好的編了号的。庫里还有許多次等的东西，沒有編号，沒有登賬的，拿一两件也不要紧。”其实这个弊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在那些所謂“古物保管专家”的手里，即使已经編号登記的珍品，他們也可以用假的換了出来。后来故宮盜宝案的发生，不就是这样吗？可惜我那时候对字画古董不感兴趣，不然的話，尽可以大大捞它一把。

四 在交际花家里处理軍国大事

大約是三月二十三、四号，前方比較平靜，蔣介石曾秘密来到北平。当时虽說是秘密，后来报纸也知道了。蔣来北平是听取各方的报告并作指示，在居仁堂开了一个軍事會議，各方面的高級將領都出席作了报告。古北口方面总指揮楊杰在席上大談其后退配备的战略，他要把南天門陣地(古北口以南的陣地)向后撤退到密云县以东地区，引敌人深入，而在兩側配备两个軍同时出击，一举就可以歼灭敌人的主力，长城战事就可以轉移为攻势，不致坐着挨打。他并且报告前方敌人不断增加，战事如何激烈，要求增援。何应欽素与楊杰不睦，素来都把楊杰叫作楊大炮，听了很不高兴，就說：“前方没有什么激烈战事吧！”楊杰說：“我刚才由前方回来，难道还不清楚？”何应欽就叫：“王厅长(倫)你立刻打电話去問問徐軍长(廷瑤)，前方的情形怎样？”王倫打电話問徐廷瑤，回話說前方很平靜。弄得楊杰當場下不了台，滿面通紅，一言不发。不久楊杰的总指揮也撤消了，由徐廷瑤代理。楊杰从此就反对蔣介石。不过日軍增加确是事实，正在部署尚未攻击，原来是第八师团，后又增

加了第六师团一个旅和一个騎兵旅团,是由多倫方面轉移过来的。

蔣介石作了最后指示,肯定地說,要以現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軍。会后随往西山碧云寺拜謁孙中山衣冠塚,并同何应欽、楊永泰和我在香山飯店吃了一頓不飽的晚飯,他就回南昌去了。交下一些問題,留楊永泰在北平与各方商量处理。当晚我即邀楊永泰到北平著名交际花楊惜惜家里去玩,順便同各方的代表商量处理問題。到有东北軍方面的于学忠、万福麟、鮑文樾,山西方面的徐永昌,宋哲元駐平代表蕭振瀛。楊惜惜是以前平汉鉄路局會計科王科长的小老婆,王某貪污了十几万元,死后这些錢都归了楊惜惜。她有自己的漂亮汽車,华丽的公館(緞庫胡同五号)。那里有酒、有色、有財,經常有些“要人”出入。我們这些人在那里真是烏烟瘴气,蔣介石交下来的所謂軍国要事,就是在那里商量处理的。

长城战事日形紧迫,北平也不能不有些軍事布置。我們調了一些部队布置城防,主要是东城和北城。駐軍在駐守地区,入夜是戒严的。在东城区苏州胡同一带素来是外侨尤其日侨活动的地方,他們不守駐軍的戒严令东竄西竄。駐軍哨兵要他們站住加以盘問,也是很平常的事。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盘問。次日酒井隆就帶了两个全付武装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見何应欽当面抗議。新华門守門的宪兵要武装的日兵停在門外,請酒井隆单独进去。酒井不答应,大鬧起来。宪兵請示,何应欽也只好让他帶着武装士兵到居仁堂。会見的时候,两个武装日本兵就站在跟前。何应欽抗議他这种无礼貌的举动,他的回答是因为在北平他的生命沒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帶同武装进行自卫。何应欽問他原故,酒井就說昨天晚上被哨兵盘問,并誑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杀

他；因此他要帶武装保护前来抗議。还說他与何应欽是旧相識、是同学，才来当面抗議，否則就会自由行动起来了。何应欽除一面向他解释道歉之外，还下令駐城部队以后对外国人要客气、要礼貌。

尽管长城战事如何紧张，何应欽和我还摆出好整以暇的姿态。有时去玩玩高尔夫球，有时去打打猎。有一天，他同我去遊頤和园，那时泮水初解，浮冰綠水之間，有上百成千的野天鵝浮游。我們問管园的可不可以打？他說从来沒人打过，所以它才年年敢到这里来快乐地遊玩，一过春天，它就飞去，一到冬天，它又回来，是頤和园的天然美景。也就是說虽然沒有禁令，可是从来沒有人打过，以免破坏这天然的美景。他說話的用意，无非是想阻止我們去打。但我們猎兴大发，莫說沒有禁令，就是有，我們一个是軍政部部长代理北平軍分会委員長，一个是內政部部长兼北平軍分会參謀长，莫說是要打几只野天鵝来玩玩，就是要打三貝子花园里（即現在的动物园）养的老虎和獅子又有誰敢来阻止呢？于是我們居然开枪打了。后来听說天鵝从此就不来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馮玉祥这时在张家口开始酝酿組織抗日同盟軍。我同馮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在徐州第一次見的面。“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到南京，又見了一次面。三月二十八日我以私人名义，同高参陶鈞到张家口去訪問他，并看看情形。他請我吃一頓粗劣的晚飯，席間他說明了他抗日的宗旨，并力詆张学良、蔣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誤国卖国。我心里想：現在长城不是正在抗战嗎？何必另立旗帜。但我又想到抗战人人有責，多一方面的号召，壯壯声势总是有益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光杆。让他搞去吧，橫直搞不出甚么名堂。因此我沒有同他辯論甚么，也沒有劝他到南京去，我就回北平向何应欽汇报。但何却对馮十分重视，他說：“老馮这个家

伙野心很大,抗战不过是用来掩护的名詞,以后如何发展,如何收拾,很成問題。”长城战事正在吃紧,只好暂时不管。

四月下旬,方振武的部队响应馮玉祥的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到了河北邯鄲。北平軍分会要他在邯鄲候命,不拨火車給他北上,他就步行到了定县。我与方振武以前也有一面之交,何应欽要我去定县,同方商量,改編后参加抗日,拟改編为两个旅,以鮑刚、张人杰为旅长。他不同意,繼續步行北上,到达徐水滿城附近。后方軍隊这样自由行动,何应欽大起恐慌,于是借口統一軍令,飭将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軍及义勇軍等名目一律取銷,其有人馬充足的部队准改編为正規軍参加抗战。这个命令的用意是想破坏馮玉祥抗日同盟軍的計劃,但不发生什么作用。方振武、鮑刚等的部队仍繼續徒步向张家口集中从事抗日,精神是令人欽佩的。

五 消极抵抗节节撤退

北宁綫方面自何柱国軍退守灤河西岸,日軍即进占撫宁、昌黎、卢龙等地,与我軍隔河对峙。喜峯口方面因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防御相当坚固,敌人避免正面攻击的牺牲,找到冷口方面的弱点。那里原是东北軍繆澂流师担任,后来商震部的黄光华师增加上去,虽然努力抵抗,但經不起日軍的攻击,冷口遂告失陷。日軍占領冷口后,分兵占領灤河上游的迁安,威胁灤河西岸陣地的側背,主力則繞到喜峯口的后面,向防守喜峯口的二十九軍形成前后夹击的姿态。因此防守喜峯口的宋哲元軍不能不撤退,北平軍分会乃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軍撤至宁河、宝坻之綫,宋哲元軍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敌人繼續前进,先后占領遵化、玉田、丰潤,向我軍压迫。我为了布置津东防御去天津走了一趟。据說潰退的东

北軍紀律很不好，他們有一句話：“媽拉个巴子是个碟吃餃子。”当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問人說是見到女人，不論老少都要奸淫。因此津东难民紛紛逃集天津。我在天津还去拜訪了亲日分子张志潭(已由南京任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員)，据說他們对日本人有什么活动。其实汉奸石友三、张敬尧已在天津北平开始活动了，与他多少有关系。我在言語之中表示要他顧全大局，听候中央处置，不可单独行动。他表示这个仗打不下去了，首先軍隊紀律太坏，人心恐慌，甚至有些人宁愿欢迎日軍到来。他的話可說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某些人。我在天津想与前方聯絡，但聯絡不上。因为那条綫(即宁河宝坻之綫)并不是預先构筑好的陣地，而是临时征些民工挖了一些土壤，更未架設通信网。前方情形十分混乱，眼見那綫也守不住。我轉回北平把情形报告何应欽。

古北口方面是敌人进攻的主力。自古北口失守，我軍就坚守南天門。南天門地形险要，不能使用很大的兵力。日軍以全力进攻，战事很剧烈，进展甚慢。徐廷瑤的中央軍三个师，起初是关麟徵第二十五师在第一綫，被打得殘了，黄杰的第二师頂上去，換下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又被打得殘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頂上去，換下第二师。由南天門而石匣鎮、而密云，节节抵抗，节节撤退，就是这样挨了两个多月，是长城抗战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地方。三月間因喜峯口二十九軍大刀队一次的胜利，上海妇女界組織妇女慰劳队到喜峯口慰劳二十九軍，对古北口方面則沒有去。我对她們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蓮說，古北口方面的战事比喜峯口方面激烈得多，她們都不相信。可見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部队都忘了。东北軍方面更沒有人理睬。

徐廷瑤軍退到密云附近，既无险要的地形，部队又皆已殘破，

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北平軍分会事先把傅作义的部队調到昌平附近向怀柔、順义出击。但經日軍的攻击,作战不利,退守順义、怀柔以北山地。日軍进至順义附近,距北平仅五十多里。而京东方面的日軍既占領三河进迫通州,宝坻日軍进迫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姿势。这是五月二十四日的情形。当日軍迫近順义的时候,日軍飞机九架飞过北平上空,飞得很低。机上的太阳敌徽及駕駛員的面目都看得清楚。那时既沒有防空警报,也沒有防空洞設備。我和何应欽听到了机声,才跑出居仁堂到假山下去躲避。我們的高射炮队也咯咯放了几响。但敌机并未投弹就飞回去了。事后英、美外交人員深不以我們的高射炮的射击为然。他們說:“日机不是来轰炸的,向他們射击,就会引起他們的轰炸或扫射。”但敌机不轰炸、不扫射,只有天晓得。也許他們外交人員事先知道吧。

这个期間,德国总顧問費而采,也同在北平参加我們作战的計劃。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总參謀长魯登道夫的作战处长。他每天都到居仁堂听听情报、看看地图,或同我們談談。但我覺得他只有一般的战略見解,尤其对中国部队的情形根本就不清楚。东北軍自灤西撤到宁河、三河之綫,又被敌人突破。他問我,那方面既不是敌人的主力,东北軍的番号又那样多,为什么守不住?这个很容易答复的問題,弄得我很难答复,只好聳聳肩膀。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他仍然到居仁堂,見办公室的作战計劃地图都揭下来了,就大惊失色。我們把情况告訴了他,請他回南京以保安全,随后就調回国去了。蔣介石后来又聘請德国鼎鼎大名的塞克特將軍当总顧問,他在德国当了很久的国防部部长,是凡尔賽条約后第二德国陸軍的保育者。我曾参加他与蔣介石的座談,蔣介石問他对日国防的意見。他說:“最危險的是这条揚子江,必須沿江建設要塞,并沿

江构筑游动炮兵陣地，沿江布置游动炮兵。否則一旦开战，日本親队就可直搗汉口，把中国分为两下。”我觉得他的意見也很平常，难道这种平常道理我們也不懂得，要請教外国顧問嗎？不过在蔣介石实行法西斯統治的时候，德国顧問是很吃香的。

六 北平被包围后何应欽乞求停战

南京政府既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除了消极的軍事抵抗之外，交涉的活动是积极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財政部部长朱子文二月底来北平就是做这个活动的。罗、宋回南京后，又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来繼續进行。他們希望通过英国駐华大使蓝浦森、美国駐华大使詹森，由英、美出面調停，把上海停战协定重演。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不似上海那样积极，蓝浦森只是向日方要求維持辛丑条約，秦皇島附近不发生战事。

南京政府不但在外交方面对英、美进行活动，作交涉的准备，同时也在內政方面調整华北的人事，为以后的妥协作准备。蔣介石曾要我兼任北平市市长，我没有同意；又叫我征求地質学家丁文江的意見，要他当北平市市长应付日本人，丁文江也不同意。五月三日南京行政院設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黄紹竑、李煜瀛、张繼、韓复榘、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羣、王揖唐、王树翰、傅作义、周作民、恩克巴图、蔣梦麟、张志潭、王克敏、张伯苓、刘哲、张厉生、湯尔和、丁文江、魯蕩平为委員，并指定黄郛为委員長。从这个委员会名单来看，包括有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华北地方各方面的人物，也就是想用这个委员会作为第一步“华北特殊化”，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黄郛是亲日派的头子，用他来当委員長，很显然是对日本表示妥协。黄郛被任命后，并不即時就职，而是在上海和